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商品瓷 浅析及相关问题探讨

梁岩华 朱冠星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扼要分析遗址出土的各类商品瓷废弃堆积,判断古港遗址中部及其西侧可能存在两处商品交易市场,并对各类商品瓷系占比、产地以及南宋龙泉瓷数量显著减少的断层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朔门古港 龙泉窑 商品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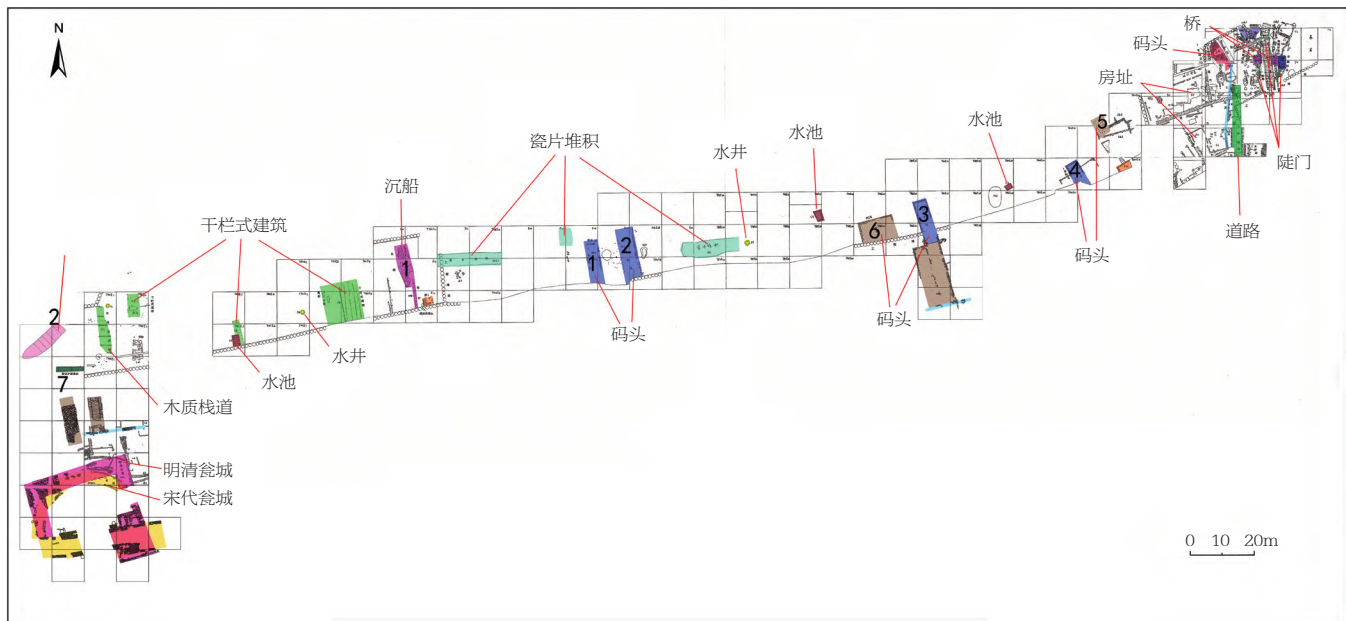
DOI:10.16319/j.cnki.0452-7402.2025.07.005

2021年10月至2022年12月,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在配合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被发现,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发掘,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宋元及清代江堤、8座码头、2艘沉船、1条木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等重要遗迹,以及几十吨各类瓷片标本、漆木器等丰富遗物。主要遗存年代集中在宋元时期。该遗址引起了国家文物局和考古界的高度关注,温州市委市政府在第一时间暂停了工程施工,在组织多轮专家会议进行充分论证后,决定对遗址进行整体原址保护。遗址于发现当年申报并成功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3—2024年,国家文物局接连批准了朔门古港遗址主动性发掘项目,重点对朔门及其与古港连接区块、3号码头南部以及水门头区块开展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五代至宋代城墙基址解剖沟中发现了唐代江岸及码头遗迹,基本厘清了古城兴废沿革;在朔门北面及3号码头区块新发现并确认了北宋、南宋岸线;新发现9号码头及渡亭,拓展揭露了7号码头等。尤其是朔门区块的发掘,通过考古手段清晰展现了温州古城北大门与朔门古港的紧密联系〔图一〕。

同时,通过与高校团队合作,我们对2021—2022年提取的几十吨标本中的十余吨进行了初步整理,统计出标本10万余件,主要包括青瓷、青白瓷、彩绘瓷、白瓷、青花瓷。以地区分,浙江地区窑址占主导地位,主要是龙泉窑,占比超过五成,瓯窑、沙埠窑等其他本地及邻近窑场的产品约占三分之一;福建地区窑场主要有闽清义窑、松溪回场窑、连江窑、德化窑、建窑、茶洋窑、遇林亭窑等,占比超过一成;江西地区窑场主要是景德镇窑,占2.8%,另有少量吉州窑产品;其他地区如广东地区有奇石窑,北方地区主要有定窑、磁州窑、当阳峪窑、鲁山窑、钧窑等,但占比均极低。

朔门古港遗址发现的瓷片约有数十吨,大量标本因需作为瓷片堆积展示仍保留在现场。区分这些瓷片废弃前是商品或日用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朔门古港遗址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古港遗址出土商品瓷

〔图一〕朔门古港遗址主要遗迹分布图
黄加量制



及相关问题谈一点粗浅认识。由于标本数量庞大，系统整理非短期能完成，笔者当前认知定不乏错漏、不实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商品瓷废弃堆积形态及认识

辨识港口遗址中的商品瓷，主要依据如下三项指标：首先是新，即标本无明显使用痕迹；其次是数量多且集中分布，须排除零星的、分散出土的标本；最后，根据标本所处地层、堆积形态、位置及相关遗迹作进一步分析。经初步判断，朔门古港中的商品瓷主要存在于以下几类堆积中：

1. 条状堆积

古港遗址发现三处条状堆积，均位于遗址邻江港口区的明清地层下：

条状堆积1：位于遗址西侧，香港大厦东北侧，与岸线平行，东西长28米，南北宽2—3米，平均厚度1.5—2.0米，边缘堆积较薄〔图二〕。主要是元代龙泉瓷片，有分层现象，底部为北宋晚期至南宋初的双面刻划花瓷器，见有少量南宋中晚期瓷片。

条状堆积2：位于遗址中部偏西，1号沉船东侧，元代岸线内侧，与岸线平行。长28米，宽2.6米，厚0.3—0.5米。主要是元代龙泉窑瓷片〔图三〕。

条状堆积3：位于遗址中部，位置偏南侧，长约20米，宽3米，厚0.3—0.5米。主要为元代龙泉窑瓷片。

三处堆积的基本形态及包含物均较一致，堆积整体与江岸平行，且夹杂大量瓦砾。堆积1底部有北

〔图二〕朔门古港遗址瓷片堆积分布示意图
黄加量制



〔图三〕条状堆积2
伍显军摄



宋晚期堆积及少量南宋时期堆积，因处于当时南宋岸线外缘，推测该堆积可能为瓷器市场倾倒入江边的废弃物(也可能包含少量江边散落堆积)。随着江岸向北拓展，拓展区成为新的用地，在新老地块之间自然形成与江岸大致平行的分隔道路。温州城古代填土主要为淤泥和建筑垃圾，其地下水位高，一旦下雨便泥泞不堪，

所以古人为方便行走，往往以瓦砾铺路。堆积1的晚期成因与堆积2、3的成因皆如此。堆积2靠近元代江岸，为岸边道路，堆积3为东西向道路，其东头有元代水井，该道路兼通行和取水之用，其横向剖面呈沟状，应为人为刻意填埋而成。

2. 片状堆积

散布于遗址西部与中部两处条状堆积之间，东西长度约40米，宽度20米以上，厚约0.1—0.3米。与条状堆积相比，其散布范围较广，堆积薄，此堆积以元代龙泉瓷为主，亦有部分宋代瓷片，南宋粉青釉瓷片多出于此。

该处片状堆积面积广，推测为一处相对集中的交易场所。商品瓷储运过程的碎片就近铺于地表。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片状堆积西面，条形堆积2南侧，发现一处建筑基址残迹，仅存基址西北角，以条石砌边，墙底打有木桩，室内地面周边用小条石砌出凹槽，推测为防潮之用。该遗迹可能为存放货物的货栈或倒塌房屋堆积。而在疑似货栈南部区域，出土了10多件琉璃质发簪等残饰件，经成分检测，来自多个不同产地，也为交易场所的判断提供了新的佐证〔图四〕。

〔图四〕遗址出土琉璃饰件
陈真健摄



3. 坑状堆积

位于瓮城北面的TN5E1探方的井状坑内，该处堆积与香港大厦东北面的条状堆积距离较近，为元代晚期龙泉窑产品。器形以碗、盘为主，胎体轻薄，釉色粉青，釉面光亮，外壁光素或于下部刻划莲瓣纹，内壁印花，有多个题材，圈足不甚规整。该批产品胎、釉及装饰风格统一，可能出自龙泉东区安仁口一带窑场。

坑状堆积的成因，很可能为某批货物在交易现场或店铺内遭遇突发事件严重受损，碎片被清理后填埋进附近废弃的窖穴或井穴之中。

4. 江底滩涂散落堆积

堆积位于朔门城外邻江港口区，向东延伸，东西长近100米，南北向揭露宽度15—20米。该区域第⑥、⑨、⑩层、出土有大量瓷器残件，绝大多数为双面刻划花龙泉青瓷，也有少量黑釉瓷和青白瓷，且以靠近朔门区域最为丰富，年代为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这些标本出在滩涂中，保存较好，有的仅残缺一小部分。其中，在TN6E8探方出土的沉船尾舵及单爪木锚周围，散布的完整瓷器数以百计，另有石磨盘、铁刀等器具。笔者曾以为上述的尾舵和单爪木锚为1号沉船（在其东侧约20米）遭遇风浪时所遗失，但有沉船专家判断构件较小似与1号沉船不匹配，且其碳十四测年数据也与1号沉船相差约100年，故该批器物及构件理应为另一艘船所遗失。

在宋代，这一区域为近岸江底滩涂，大约至宋末元初才被填埋成陆地。由于该堆积刚好位于7、9号码头及疑似栈桥式码头外侧，年代也刚好同期。所以这片堆积是货船靠岸时的散落瓷器堆积以及码头、江边搬运过程中的商品瓷废弃物。

上述四类堆积的形态、成因及年代各不相同。其中条状、坑状和片状堆积三类，根据位置及相邻关系

〔图五〕朔门外码头群（北向南摄）
梁岩华摄



可整合为两大片区：1. 西片区，含条状堆积1与坑状堆积；2. 中片区，含条状堆积2、3与片状堆积。鉴于朔门外近岸港区与西片区邻接，也可归并入西片区。

西片区位于朔门城外之西侧，堆积规模大，延续时间长，自北宋晚至元末明初，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据元黄潜《永嘉重修海堤记》记载，北门外有枕江亭和侯馆，“亭之西为市区，百货所萃，麇氓贾竖，咸附趋之”^{〔1〕}。所记位置与此相符。据该碑记，在宋元时期，朔门西片区可能一直是重要的商品交易市场。但因今香港大厦及其西侧地块已实施旧城改造，当年市场状况已不可知。该片区早年所使用的码头应该就是7号码头。7、9号码头东西并排，均位于朔门外，在较长时期内同时使用。9号码头为台阶斜坡混合式，用石条石块砌筑，建筑考究，对应岸上设有渡亭，很可能为客运码头〔图五〕；西侧7号呈斜坡式，毛石砌筑，规模较大，宽4.3米，长近40米，直抵城门附近，更适合货运。而代替它们使用的木栈道（桩基打在覆盖9号码头的淤泥中），桩基宽2.6米，桩基间距2.7米（近岸处缩短），用材大方，制作规整，桩基向航道延伸，揭露部分达39米，其前端码头部分已伸入航道（工程止水桩以外，暂不具备发掘条件），应可靠泊更大的海船。或许它们就是西区交易市场早期使用的主要码头。

中片区有较大范围的片状堆积连接着两处条状堆积，东西长约100米，规模可观。年代主要为元末明初，片状堆积底部散布有南宋晚期龙泉瓷，不乏龙泉南区产品。早期的宋代1、2号码头叠压在本片区

〔1〕 （元）黄潜《永嘉重修海堤记》，载（明）王瓚《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词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49页。

之下，北面亦可能有元代码头（因受潮汐影响地下水位高，暂不具备发掘条件）。在1936年版地图上^①，本片区北面有中堂码头，南面有小巷与城外道路朔门街（时称外横街）连通〔图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片区西部的疑似店面或仓库遗迹南侧附近出土有多件发簪等琉璃饰件，经检测来自不同产地。这些迹象显示，该片区是以龙泉瓷器为主的商品交易市场，包含有南宋粉青釉瓷等高档货物及一些琉璃饰品。

据黄潜《永嘉重修海堤记》载：“凡为马（码）头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达商舶。”^②元时已有专用客运和货运两类码头。循此思路，遗址东片区虽有3—6号和8号等码头，但因附近未发现瓷片堆积，多半与瓷器交易无关。其中的3号码头为三级月台式，以块石砌边（底部打有木桩支撑），中部填土，外缘以木桩围护，前端平台在中部填土上方支垫厚木板，上铺平整方砖，外围以石块包嵌，以防地砖被潮水冲走。其制作考究，但恐不适于货物装卸，很可能是专用于客运的码头。

二 商品瓷系及产地初步分析

上述商品瓷废弃堆积中，龙泉窑产品占绝大多数，以龙泉窑东区窑场为主，龙泉南区、瓯江下游永嘉境内窑场、松溪回场窑产品数量不少，飞云江上游窑场产品也有发现〔图七〕。其他瓷系产品主要有本地瓯窑、近邻沙埠窑产品，以

〔图六〕1936年永嘉县城市全图（局部）

采自钟翀编《温州古旧地图集》（温州通史专题史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78—79页



〔图七〕宋元时期龙泉青瓷

陈真健摄



① 钟翀编《温州古旧地图集》（温州通史专题史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78—79页。

② 前揭（元）黄潜《永嘉重修海堤记》，第549页。

〔图八〕北宋瓯窑青釉内底刻花碗
伍显军供图



〔图九〕遗址出土福建地区黑釉瓷
陈蓬蓬供图



及福建地区的黑釉瓷、青白瓷等。

瓯窑主要为北宋早中期淡青釉标本，多出在朔门北面基坑的北宋地层中，水门头地块的水门河道和8号码头附近地层中也有出土。早期标本器形以碗、盘、盏、壶为主，胎骨灰白致密，盘、碗内底心刻花〔图八〕，有的碗外壁划饰折扇纹。施淡青薄釉，制作较精。至晚期后，制作质量明显下降，多见褐彩绘钵、壶及褐釉侧把罐、小盏等。日本著名学者上田恭辅于《支那古陶磁研究の手引》中，在分析日本镰仓海滨地区所发掘的大量青瓷标本时指出：“昔时盛产青瓷之窑是温州、泉州与安溪，其他亦有小规模之窑。”^{〔1〕}2023年笔者参观青龙镇遗址时，曾见到内底心刻花的瓯窑标本，应系销往日本或韩国等地的商品。晚期产品则多见使用痕迹，少见商品瓷。

沙埠窑产品与龙泉瓷共出，基本未见使用痕迹，应为商品瓷。

黑釉瓷产品多为福建生产，常见的建窑、遇林亭、茶洋、东张窑在商品瓷中均有发现〔图九〕；遗址中其他区域亦有较多出土，有明显使用痕迹，非商品瓷。

青白瓷标本中，闽清义窑产品在宋代江底散落堆积中占有一定比例，但在元代瓷片堆积中不多见。景德镇青白瓷在朔门古港遗址中出土数量虽然较多，却少见于商品瓷废弃堆积中，且绝大多数有明显使用痕迹。

从上述各类商品瓷分析中可以看出，朔门古港在浙南、福建等邻近地区的瓷器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关注的是景德镇青白瓷产品，在古港遗址中无使用痕迹者数量很少。作为宋元时期外销瓷的明星产品之一，其在温州港的这一现象值得探讨。笔者推测，景德镇青白瓷的大量外运应主要通过长江航道，在航线便利和枢纽港优势地位比较两方面，温州港均不如北面宁波港和南面泉州港。东海航线宁波港无疑更近更便捷，南海航线则以泉州港更具优势。景德镇青白瓷运往温州港或许主要系为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而非外销。

〔1〕〔日〕上田恭輔《支那古陶磁研究の手引》，东京：大阪屋号，1937年，第272页。

三 古港龙泉瓷标本南宋断层现象探讨

遗址龙泉瓷标本以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元末明初这两个时间段最为集中，中段特别是南宋中晚期标本显著减少，这一断层现象很不寻常。据相关史料分析，温州港于南宋初年设立市舶务^①，并设有来远驿、待贤驿等，负责接待外商、外宾事务。程俱于南宋初年游历温州时，曾赞叹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②。至庆元元年(1195)市舶务废置^③，温州港作为市舶港口的时间长达60多年。而即便市舶务废置也仍然可作为供给港进行转口贸易，出现断层现象似乎很难理解。要解释这一现象，需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1. 风暴潮破坏 在遗址西侧挖机作业的基坑内，考古队在深达10米的地下发现了含北宋碎瓷片的地层，在其后对基坑的发掘中，发现了7号码头头部、2号沉船和一件完整的系缆木石锚。最让人关注的是，该处基坑的第⑩层及以下数层厚达3—5米，含多个泥沙互层。我们将其作为事件地层，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和宁波大学地理系专家团队开展研究，并请北京大学夏正楷教授进行指导。目前，系统检测已经完成，结合史料，专家们一致认为，该事件层是由北宋末年开始的连续多次风暴潮袭击所造成的。加之期间海平面的持续上涨^④，对温州城市、港口及水利设施威胁极大。特别是乾道二年(1166)的温州大海溢事件^⑤，导致温州城被淹没，民居被摧毁，数万人死亡，给温州带来深重灾难。朔门外7号、9号及木栈道也因被泥沙所覆盖而废弃。目前朔门城外已揭露南宋岸线，但尚未发现该时期码头。可能原码头废弃后，新建码头向上下游方向挪动，从而偏离了朔门古港遗址目前发掘区。

2. 市舶务选址偏西 朔门古港尽管因有两处古城地标建筑——中轴线北大门以及为全城排污排涝的奉恩水门，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毕竟仅为温州古港的一小部分，其长度约为当温州古港的五分之一。若要评判温州古港的历史地位，自然不能仅依据朔门古港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据地方史志，南宋市舶务设在龙首桥北^⑥，也即在朔门西面较远的定安门以南〔图十〕。这可能意味着南宋时期的主要交易场所设在了古城北埠西部。大约随着市舶务设置，交易市场规模扩大，官方接待事务日繁，而朔门城外地域逼窄，难免拥挤不堪，二者难以兼顾。分开布局有利于强化朔门作为北大门所承担的官方接待职能。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司》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71页。

② (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二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356页。

③ (宋)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宁波出版社，2022年，第324页。

④ 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环境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第71—78页。

⑤ 前揭(明)王瓚《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七《祥异》，第455页。

⑥ 前揭(明)王瓚《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五《古迹》，第413页。

〔图十〕南宋、明代市舶机构位置示意图

改绘自前揭钟钟编《温州古旧地图集》（温州通史专题史丛书），第68—69页



另外秦大树教授2022年考察遗址后曾做过推测，北宋晚期至南宋初的龙泉瓷器贸易有官方贸易特征。^{〔1〕}如果说南宋瓷器市场偏离官方色彩浓厚的北大门意味着贸易主体的某种改变，甚至影响了市舶务的管理，那么元代龙泉瓷标本再次在朔门古港大量集中涌现就不由让人联想到市舶机构的回迁了^{〔2〕}。

3. 接驳船装货 温州古港除东西两边的海坛山、郭公山脚地带岸陡水深以外，两山之间的江滩地势大都较为平缓，近岸水深较浅，加之受潮汐影响，大型海船不易靠岸，此时就会用较小的接驳船转移人员和货物。宋元史料中屡见运输途中大小船之间的转换，也许因其过于寻常，具体转接方式少见刻意言明者。幸有宋代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细描述了使团的神舟抵达高丽礼成港的场景。该书卷二十四载：“神舟既抵礼成港，下碇讫，丽人具采舟来迎使者，奉诏书登岸。”^{〔3〕}神舟到达礼成港后，并未靠

〔1〕（宋）赵鼎《建炎笔录》载：“三月，车驾在温州……十九日，御舟发温州，著浅，行数里而止。大致记载了高宗某次乘坐大海船在温州港仅行数里就搁浅了，需等水位再次涨高后才能脱困。可见大型远洋船入港后也不便随意靠岸。

〔2〕《弘治温州府志》未记载元市舶司地址，所载明代市舶分司设在了与朔门联系密切的子城内，而清代瓯海关正好坐落于朔门外，其北面专设有海关码头。见前揭（明）王瓚《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五《古迹》，第413页。

〔3〕（宋）徐兢撰，虞云国、孙旭整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四《节仗·初神旗队》，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三四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56页。

岸，而是抛锚停于港中，等待高丽人用采舟来迎接使者登岸，引文中的“采舟”当为接驳船。宋赵鼎《建炎笔录》载：“三月，车驾在温州……十九日，御舟发温州，著浅，行数里而止。”^{〔1〕}大致记载了高宗某次乘坐大海船在温州港仅行数里就搁浅了，需等水位再次涨高后才能脱困。可见大型远洋船入港后也不便随意靠岸。元代王振鹏款《江山揽胜图》中对接驳场景也有详细的描绘^{〔2〕}，表明这在当时的温州港应是常见景象。接驳船的使用降低了对码头及水深的要求，也使得散落货物扩散到较深的水域。

朔门古港发现的1、2号沉船虽为海船，体量都不算大。但7号码头前端用作压边石的两件巨大石碇，却实证了大海船的存在。石碇为花岗岩石质，整体略呈长条磬状，厚度均匀，中间一周凿出浅凹槽。两石大小相近，长3.2米，厚0.4米，最宽处在中间，两边呈斜坡状收窄。最宽处分别为0.59米和0.56米。应是目前国内所见质量最大者之一。该碇石通过锚杆夹紧、捆扎而与“V”形双爪组合成木石锚，可供大型海船使用。

不过，朔门古港遗址南宋龙泉瓷标本也并未真正断层。在遗址西区条状堆积1以及中区片状堆积中仍占有一定比例。中区片状堆积因散布面积广，数量应是比较可观的。可惜的是，当初为配合道路提升工程，工期紧迫，考古队只得将精力主要集中于寻找硬遗迹上，对于地层中出土的瓷片未能全部提取，故而给人以断层的错觉。

综上，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作为国内唯一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体系中具有补白之功，地位殊为重要。在瓷器贸易特别是龙泉窑产品销售方面，朔门古港遗址坐实了温州港作为宋元时期龙泉瓷器主要出海港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温州港通过瓯江及境内飞云江，连接着庞大的龙泉窑产业体系，成为“龙泉天下”的起点港，进而将其影响力辐射至浙南和福建等广大地区，成为宋元时期我国主要的市舶港口之一。温州港处于宁波和泉州港的中间位置，在龙泉瓷外销中具有双重身份的独特优势：既可作为市舶港直接进入远洋航线，又方便兼顾东海和南海航线，充当宁波、泉州的补给港，从而为龙泉青瓷大规模外销提供了坚强支撑。但在另一大主流外销产品——景德镇青白瓷的外销中，这一左右逢源的优势位置却不幸成为明显短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各港口间竞合关系的此消彼长，对于当今中国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梁岩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朱冠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1〕 (宋)赵鼎撰，李蹊点校《忠正德文集》卷七，载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编《山右丛书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27页。

〔2〕 余辉《确立“多学科解析法”——以认知〈江山揽胜图〉卷为例》，载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五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85页。

and Java had already begun maritime trade with China. This historical progression provides evidence for maritime route chang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offers cultural an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

KEYWORDS: the Han to the Six Dynasties; maritime silk road; land-sea combined transportation routes; Malacca Strait; trade pattern changes

The Excavated Commercial Ceramics at the Shuomen Ancient Port Site in Wenzhou and the Related Issues Considered

Liang Yanhua Zhu Guanxi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32 to 041.*

ABSTRACT: This thesis presents in outline the discarded piles of commercial ceramics of types excavated at the site of the Shuomen Ancient Port, pointing that there used to be two commodity transaction marke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ites. The unearthed objects in proportion, birthplace as well as the stratigraphic phenomenon indicate considerable reduction in the quantity of the Southern-Song Longquan ceramics.

KEYWORDS: the Shuomen Ancient Port Site; the Longquan kiln/ware; commercial ceramics

On the Ceramics Exclusive for the Early Lê Palace of Annam in the 15th Century

Gao Xianping Shao Xin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42 to 054.*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eramic objects with exceptional class and quality discovered at the Th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site in Vietnam ever since 2002 has drawn scholars' attention to the court porcelain of the Later Lê Dynasty of Annam (Đại Việ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excavated objects are there a large quantity of official-styled ceramics decorated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motifs, which are contrasted and analyzed scientifically with the imperial porcelain fired in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s. But, But, compared with the porcelain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and palace of the Ming Dynasty princes in recent years, and by the ritual hierarchy under the tribut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type of Vietnamese ceramics closely resembles to the early Ming dynasty's 'princely ceramics' (藩王用瓷). The emergence of the ceramic tradition can be traced to a confluence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unique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15th-century Annam (aligned with the early-mid Ming period), its historical ceramic traditions, intensive cultural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with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evolving state policies and nascent ethnic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he Early Lê Dynasty of Annam; Th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site; court ceramics, princely ceramics